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美竞争

钟飞腾

【摘要】美方不顾中国的反对，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中方目前对此有三类解读，分别是美国误判论、美国地位焦虑论和中美国内治理差异论。本文认为，美国过早地走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出了美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赶超最先进的国家，而是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而美国最近十年也正采取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一变革在方法上的启示是，中美都需要打破整体主义的思维，重视国内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对对外关系的影响。美方之所以误读中国并产生地位焦虑，其实是将中国沿海地区超常规的发展看作是未来中国的权势地位，夸大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取代美国的意图，美国也没有理解中国反复强调的人均低、总量大的二元特征对外交政策的约束。展望未来，中美都应该看到彼此国内都存在着参与国际竞争较少的地区对本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美竞争；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发达国家

【中图分类号】D82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22)06-0069-27

引言

当前，中美竞争的色彩益发浓厚。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作美国今后一段时期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领域的

【作者简介】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大国崛起的决策与国际研究的互动机制”（自主选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2）”。

“唯一竞争者”^①。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这一定位，不仅要比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更趋严厉，而且也进一步改变了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将中美关系分为竞争、合作与对抗三项内容的布局，转而更加突出竞争。拜登政府在该份报告中甚至提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②中国也意识到，未来十年将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例如，2022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未来十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也是美国认为阻挡中国崛起的最后契机，中美竞争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③就“未来十年是关键十年”这一认识而言，中美似乎有着高度的共识。

与此对应的一项重大分歧是，美国认为中美陷入全方位竞争，以至于可以基本同等于战略竞争，而中国政府并不同意美国政府用“战略竞争”来定位中美关系。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认为在经贸领域进行竞争是正常的，但超出经贸领域，使用“战略竞争”来描述双方的关系是极其危险的。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视频通话时曾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④2022年9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所谓的‘战略竞争’正在以危险的方式定义、影响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变数。”^⑤不过，中国政府的这一告诫，并没有改变拜登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调，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将中国视作唯一的最大竞争者，并且竞争的领域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广泛地包括外交、军事和技术领域。

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力度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也认识到了美国对华关系中的这一面。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

① The White House,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pp. 8, 23.

② The White House,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p. 24.

③ 裘援平《如何加快培养国际关系领域复合型专业人才》，2022年9月28日，<https://sis.nju.edu.cn/fa/3f/c46083a588351/pagem.htm>

④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⑤ 《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9月24日第3版。

安全主动权。”^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中国今后将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②与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大国关系的描述相比，“良性互动”和“和平共处”是新增加的，并且“和平共处”被置于构建大国关系格局三原则的第一原则。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并不算是“良性互动”，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增强，并可能带来极其重大的风险。多数学者也认为，特朗普执政标志美国对华政策开启战略竞争时代，而拜登政府上台强化了这一趋势^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需要加以重视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中美在看待彼此关系的性质时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认定竞争成了中美关系的主基调？

一 既有文献的解读及其不足

在理解中美关系从合作走向竞争为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解释是，美国对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误判。我们可以将这类观点概括为美国误判论。2020年8月，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演讲，该研究院院长德蒙布利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提了一个欧洲人所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即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拒不接受可能失去的世界主导地位。对此，王毅表示“美国可能不愿意放弃世界主导地位，但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并且，王毅强调“中美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权力之争，不是地位之争，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面临问题的本质。”^④ 2021年7月，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表示“归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⑤ 202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会见来华履新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指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页。

^③ 参见门洪华《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④ 王毅《中美不是权力之争，美国现在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中国外交部网站，2020年8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34/xgxw_679140/202008/t20200831_9338872.shtml

^⑤ 《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人民日报》2021年7月27日第3版。

“美方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想着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① 在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王毅表示 “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主观臆测，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②

美国误判论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包含的因素是多元和复杂的。例如，在驳斥中美关系不是权力之争、地位之争和社会制度之争的同时，也注意到美方态度的变化牵涉到认知和战略误判，同时美方在行动上打压、遏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理解有误，且参杂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美国误判论实际上涵盖了被学术界曾广泛争辩过的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导致中美竞争的观点^③，也包含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引发的对中国的担忧^④。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由来已久，也未曾妨碍中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合作关系。因此，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实力地位变化引发的问题，其中一个方向是讨论中国有无挑战的意图，即中国是否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将实力地位与崛起国的意图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是权力转移理论所重视的研究方向^⑤。

第二类是美国地位焦虑论。这类论点的聚焦点转向美国，基本观点立足于既有大国很难接受地位的下降。在有关美国大战略的辩论中，美国学术界、智库以及权势集团达成共识，并且不需要进行质疑的一点是美国必须维持首要地位^⑥。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持久担忧。例如，马来西亚学者在分析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动机时强调，美国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而是防止霸权的衰落^⑦。韦宗友认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从美国领导人更替、中国外交“咄咄逼人”和权力转移等角度的研究均存在不足。他主张，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及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触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因此，与中国政府的判断一致，地位焦虑论的分析重点放在了美国这一边，而不是像权力转

① 《王毅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9日第3版。

②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日第2版。

③ 参见节大磊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

④ See Stephen G. Brooks &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Winter 2015/16, pp. 7–53; Michael Beckley, “How Fear of China Is Forging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2, 2022, pp. 68–85.

⑤ 这方面的文献已经非常多，可参考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著，陈琪、吴文成译《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

⑥ Benjamin H. Friedman & Justin Logan, “Why Washington Doesn’t Debate Grand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0, No. 4, 2016, pp. 14–45.

⑦ Pei May Lee & Nina Nurasyekin Zulkoffi, “US-China Relations: Trade War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Hegemon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2021, pp. 131–155.

移理论那样将矛盾的起因归结为崛起国的“修正主义企图”^①。2022年9月王毅外长在纽约亚洲协会的演讲中指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形成所谓‘威胁膨胀’，是典型的过度焦虑。用传统大国走过的老路来预测中国，将形成严重误判。”^②为减少美国的焦虑，韦宗友在上述文章中曾建议，中国应继续向美方传递中国无意在亚太或全球建立霸权、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信号，进行安抚。不过，从10月份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表述来看，美国政府并未接受中方多次的解释和说明，也不相信中国无意挑战美国霸权。在绝对的实力地位即将错位和转换时，美国认为中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已不那么重要了。

地位焦虑论的一个不足是，由于它与地位变化联系十分紧密，因而它不太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其地位还未显著下降，特别是中美实力对比并未显著缩小到2/3时，已经将中国视作最大的威胁。例如，由美国国防部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领衔于2001年发布的《2025年的亚洲》报告即指出：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③。彼时，无论是从经济、外交、军事还是技术领域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这份报告指向的时间段来看，明确到2025年，中国将在亚太地区构成美国最大的威胁。依据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展望研判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应是那个时期美国战略界的一个普遍做法。例如，兰德公司在2000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未来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9%，中国的GDP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该报告认为，实力地位的提升必将重新定义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而直接或间接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许多现有利益^④。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便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不过很快由于全球反恐的需要而与中国再度深入合作。2002年2月，随同布什总统访日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美国不会再给中国贴上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美国将追求实际利益^⑤。尽管如此，也有论者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发轫于小布

① 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其他学者也强调霸权国具有更强的动机规避损失，并认为美国外交范式的转换发生在2010—2011年间，而中国被迫跟随，在2013—2014年间发生了外交范式转变。参见 Jianren Zhou, “Power Transi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Diplomacy: Why China and the US March toward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1, 2019, pp. 1—34.

② 《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9月24日第3版。

③ 转引自古平《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认识问题》，《人民日报》2001年8月31日第3版。

④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2000, pp. 2—4.

⑤ 《日美首脑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2年2月19日第3版。

什执政时期^①。

第三类新近出现的解释则聚焦于中美两国国内治理的差异。胡然和王缉思认为，最近十年，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均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和治理能力的较量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由此造成了中美两国定位的差异，并进一步驱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②。按照这一观点的预判，中美两国的外交均呈现出更加关注如何服务于国内政策的需要。事实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学中所假设的小国经济转向了大国经济，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内政策具有国际效应。更需要加以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中国继续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③。上述提法，与美国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联盟对抗崛起国以及唯“自由民主”独尊是相当不同的。而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哪一类国内政策和什么样的发展对美国维持霸主地位更具挑战性。

二 理解中美竞争的新视角和理论框架

美国对中国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担忧越来越强烈。这种对崛起国的担忧虽然是美国某几届政府的判断，但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例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源就被认为是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恐惧。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曾指出：美国存在“中国恐惧症”，而且还在蔓延^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成功的对华战略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低估中国的实力。低估会滋生自满，而高估会产生恐惧，两者都可能导致误判。”^⑤

中国学术界曾得出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对比达到 60% 或 2/3 时将引发崛起国的打压这样一种经验性判断。例如，金灿荣在 2015 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

①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

② 胡然、王缉思《论中美关系与国内治理》，《当代美国评论》2022 年第 3 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1-63 页。

④ 秦刚《美国存在“中国恐惧症”，而且还在蔓延》，中国新闻网，2022 年 8 月 19 日，http://news.youth.cn/gj/202208/t20220819_13933457.htm

⑤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1, 2020, p. 13.

“虽然中国舆论界贬低中国 GDP 世界第二的意义，但外界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对于美国来说，盯住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达到美国的 2/3 就将它整趴下。”^① 2018 年，笔者也曾注意到这类说法 “人们比较重视的一个转折点是崛起国占守成国力量的 60%。”^② 张宇燕在 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实力依然是衡量国家力量对比最常用的指标，2018 年中国 GDP 约为美国的 2/3，“关于这个 2/3，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即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 GDP 之比达到了 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就会发生深刻变化。”^③对崛起国和守成国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冲突会出现临界点的判断主要来自权力转移理论。例如，该理论的主要代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教授库格勒曾认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守成国的 80% 时，就开始进入了权力转移阶段。库格勒还将崛起国实力超出守成国，且将达到守成国的 120% 的这一过程定位为最危险的阶段^④。显然，目前中国学者对临界点的看法与美国学者有所不同，至少认为不用达到 80%，美国已开始持续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类论断正在持续影响美国政学两界，中美关系发展似乎出现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出任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杰克·沙利文曾在 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用“冷战”来类比中美关系，既夸大了中国造成的生存威胁，也贬低了中国与美国长期竞争的优势。中国的危险性不如苏联，但仍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其原因在于：“在上个世纪，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美国对手从未达到美国 GDP 的 60%。而中国在 2014 年通过了这一门槛。从购买力的角度衡量，中国的 GDP 已经比美国高出 25%。”^⑤ 在沙利文之前，从未有美国高官或者学者使用 60% 这样一个门槛值来研判中美关系的走向。第二位采用 60% 说法的学者是年轻的杜如松，其在 2021 年出版的《漫长的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一书中做出如下论述 “中国带来的挑战与美国以往所面临的任何挑战都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美国对手或对手联盟达到美国 GDP 的 60%。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魏玛德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的联合力量，抑或经济实力巅峰时期的苏联，都没有跨过这一门

① 金灿荣 《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② 钟飞腾 《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

③ 张宇燕 《国际变局及其给亚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日本学刊》2019 年第 4 期。

④ 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著，陈琪、吴文成译《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3 期。

⑤ Kurt Campbell &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 99.

槛。然而，早在2014年，中国就悄然达到了这一里程碑。当人们根据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行调整时，中国经济（在2019年）比美国经济高出25%。因此，很明显，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华盛顿应对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方式将决定21世纪的进程。”^① 拜登入主白宫后，杜如松成为美国国安委的中国事务主任。沙利文和杜如松等人似乎已被中国学者有关临界点为60%的这一说法说服。不过，美国官员得出的结论与权力转移论的视角类似，即崛起国由于具备了实力而呈现出改变现状的姿态。中国的持续强势崛起，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美国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而要坚持加大对华遏制力度。

由于对崛起国的意图或崛起国对现状满意与否的讨论极为复杂，我们转而进一步解释的是如何准确评判中国的实力，为何美国眼中的中国实力与中国人自身感受到的国力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广泛国际交流经历的傅莹大使曾指出：国内外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这个问题上存在极大的认知差异。外界基本认为中国已是世界强国，而中国多数人则喜欢强调中国“大而不强”^②。傅莹大使的这一结论不是与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人士交流后得出的，而是建立在与上百个国家不同类型的群体交流之后形成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可信性。由于认为中国还不够强，中国人往往习惯于设定“要建立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种种目标。从一定程度上说，目标提出之后，即便还未实现，也会被美国人当作是对其地位的挑战。准确判断美国对华的看法和做法，需要理解“美国看到的中国”与“中国人自己感受到的中国”为何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新变化引发美国过早地与中国走向了战略竞争。

美国误判论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关注中国成长最快、冲击最强的那部分力量。2018年出版《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书的迈克尔·贝克利最近改变了他的观点，竟然宣扬起“中国威胁论”。贝克利认为，历史表明，只要一个国家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战略商品和服务，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时代的主导者，而中国正在控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和电信在内的现代战略部门。为了避免被中国控制，美国以七国集团为核心强化联盟，减缓中国的发展，并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③。在短短的4年内，贝克利从一个“中国国力怀疑论者”转变成了“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似乎表明他从关注中国的弱项转向研判中国优势项目的发展趋

^①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6.

^② 傅莹 《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党员文摘》2019年第5期。

^③ Michael Beckley, "Enemies of My Enemy: How Fear of China Is Forging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2, 2022, pp. 77-78.

势。在其新近出版的《危险地带：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一书中，贝克利更是渲染美国将很快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其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的权势地位已经达到峰值，未来将因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因此，中国将因为对未来衰退的恐惧而产生武力扩张的冲动^①。如果单论经济增速下降，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的数据显示，未来几年下降更快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贝克利的这一论证似乎更符合地位焦虑论的观点，即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更有冲动先发制人。事实上，随着中美高科技竞争的加剧，美国产业界形成的一种新看法是，鉴于中国台湾地区是全球先进芯片的生产基地，如果听任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那么美国将失去对这一战略性产品的主导权^②。

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犹如竞技体育一样，是最优秀的领域和人才参与竞争，因而美国并不太关注中国的落后区域和落后领域，而是聚焦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领域。尽管很多国家高度赞扬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但美国政府似乎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对于推动全球发展的可能贡献，也不愿意相信中国仍将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巩固这一领域的成就。美国更愿意陈述的故事是，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更快速，从而很快具备国际竞争力，身处与美国博弈最前沿。中美贸易摩擦中颇受关注的华为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公司，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华为公司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报道^③。

中国政府在表述自己的国际身份特征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将自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并经常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提出“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这是许多外国人不容易理解的。”^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了解的事实，为什么许多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除了美国这个人口超过3亿的国家，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均小于1亿，很少有人会在国际比较时扩大10倍来适应中国的人口规模，因而欧美学术界进行实证研究时的尺度在数量级上要远小于

^① Hal Brands & Michael Beckley,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2022.

^② 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公布的数据，美国生产全球所有芯片的19%，中国大陆供应35%，台湾地区供应15%，但台湾地区制造了世界上92%的先进芯片。参见 Kenin M. Spivak, “The Chips Are Down”, November 3, 2022, <https://americanmind.org/salvo/the-chips-are-down/>

^③ Jill Goldenzel, “The U. S. Tightens the Noose on Huawei—and China”, October 25, 2022, <https://www.forbes.com/sites/jillgoldenzel/2022/10/25/the-us-tightens-the-noose-on-huawei-and-china/>

^④ 《温家宝总理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4日第1版。

中国的实际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归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典型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果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那么规模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①。最近一些年，中国政府更是反复强调，尽管中国已经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但也还有人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群体^②。可惜的是，这样一种二元论并不能让美国政府得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并不是要等到中国14亿人口都发展起来了才做出政策应对。实际上，美国往往根据中国最强的区域和领域的发展事实，就推断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有可能对美国形成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和研判中国最强区域和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才能准确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趋势。

比地位焦虑论更加持久和长远的观点是，美国战略界在研判威胁时，并不局限于当下，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态势。如果未来的中国存在挑战美国的可能性，那么也会被当作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由此可能提前采取措施，即所谓先发制人^③。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展望到20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发展愿景，为什么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美国当作最主要的威胁呢？同样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尽管很多国家都会提出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愿景，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如期实现目标。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国家的规划停留在纸面上。真正让美国颇为忌惮的事实是，中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记录之好前所未有，因而中国新近提出的目标也极有可能实现，以至于美国认为这种挑战的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和美国的治理体系的确非常不同，但在拜登政府所列出的四个领域——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中，真正差异极大的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联邦政体，且三权分立，外交和军事权力归属总统。同样，外交和军事也是归属中国中央政府的事权。中国政府历来强调，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军事更是完全由中央控制。就此而言，中美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权力分配极为相似。但是，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中美的治理差异很大。中国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管经济和金融大权，具有调动资源的能力。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中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0年5月29日第1版《“6亿人每月人均收入1000元”？国家统计局回应》，人民网，2020年6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615/c1001-31747507.html>

③ 金骏远、曾渝《兹事体大：当前中美危机不稳定性之迫切危险》，载门洪华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一辑），2016年，第255-293页。

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① 在这样的制度引领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目标引导色彩，并且数度完成了规划的目标。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持续数十年实现多个既定规划目标，甚至超前实现，才引发了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担忧。美国强势打压中国的动机，与其说是对当下的担忧，不若说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战略目标能力的担忧。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 与以往相比，中国对“技术”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被作为2050年的目标列入政治报告之中，但并未从指标上进行细化。从约束性指标和更具指导价值的目标看，更重要的是到2035年的一系列安排，因为这是对中美都十分重要的“关键十年”。2035年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纳入“强国”这一更具权力竞争色彩的指标。既有的学术文献中也很少能看到将“现代化”和“强国”联系在一起的指标体系。中国政府以往做规划时，大体上只对未来15年的发展远景列出详细的指标，对更长时间的规划是没有约束性指标的，而往往只有一个笼统的说法。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做的一些5-15年内的规划基本都实现了既定目标。与2050年的远期目标相比，2035年的中期目标更具有应用价值。

三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真正推动中国发展战略实施和落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是更具指导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现代化”这个目标之后，在目标的实现时机以及内容等两个方面，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实践证明，目标定得合适与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更为本质和务实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和目标的提出及其完善，主要依赖于对本国国情的准确认识和发展能力的准确评估，“现代化”一词虽然借用自西方，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并不以赶超某些国家为目标，而主要是阶段性实现对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1. 第一阶段: 计划于2000年完成“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始于1964年。当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截止时间定于20世纪末,就连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并未改变这样一种时间设定^②。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并且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概念。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时是与自己做比较,而不是以赶超世界最先进国家为指导。1958年设立的“赶英超美”目标已被实践证明犯了重大错误,经过多年的摸索,中国领导人更为实事求是,承认需要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发展道路。不过,这种探索并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当时仍表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1979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与日本的现代化概念不同,而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小康之家”。1980年10月,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争取2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③。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实现时间仍是20世纪末。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提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④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⑤这一论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例

①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

② 1978年12月发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直至1980年初,《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仍有“本世纪末实现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法,参见本报评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人民日报》1980年2月17日第1版。

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人民日报》2021年7月28日第6版。

④ 邓小平《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⑤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如，1987年4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会见中美洲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时也指出：“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一个大国。说大，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说小，是因为中国经济比较落后。”^① 在中国领导人心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国也不够资格被当作大国对待。因而，设定小康目标和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与其说是追寻大国梦，不如说是务实地解决本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邓小平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就中国想要成为的“大国”是个什么样子做出准确说明，但邓小平当时提过的两个概念值得重视。一是在会见大平正芳时曾提及，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②。另一个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有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③ 第一个概念“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和第二个概念“中等发达国家”，其实是一个意思，它们指代的国家，既可能是邓小平曾经到访过的新加坡，也可能是东欧和拉美的几个国家。例如，197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曾指出“南斯拉夫现在已建设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④ 1981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认为，拉美地区是第三世界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国际经济界人士以及某些国际机构，都倾向于把拉美地区列入新的世界中产阶级阶层，并把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这样一些拉美国家称之为中等的发达国家。”^⑤ 1988年1月，《人民日报》记者在访问南斯拉夫后一篇报道中认为：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说法是“南斯拉夫按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按消费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⑥。

2. 第二阶段：计划于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和目标的提出，对中国的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到21世纪中叶之前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

① 《李主席会见埃斯基韦尔总理》，《人民日报》1987年4月9日第1版。

② 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7页。

③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216页。

④ 《大胆引进 加快速度》，《人民日报》1978年9月17日第3版。

⑤ 郭伟成《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1月23日第7版。

⑥ 陆超祺《南斯拉夫：为克服经济危机而努力》，《人民日报》1988年1月5日第7版。

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1991年初,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要求今后10年平均每年增长6%,这样才能实现“翻两番”,实现从温饱到小康(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阶段性发展目标^①。实际上,原定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1997年,中国又提前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根据当时的测算,“截至1997年底,我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86.5%”^②。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1997年的中国仍处于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点上,离完全实现小康社会仍有一段路要走。

在此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区域和城市。根据当时的测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54美元,被认为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③。2002年,浙江绍兴县人均GDP达到3911美元,被认为初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④。2005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认为,韩国已处于中等发达水平国家之列^⑤。2008年,北京人均GDP突破9000美元大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北京市正处于上中等国家和地区中的较高水平^⑥。此时,全国的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

虽然中国整体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仍需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若干地区先行一步,先富裕起来,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深圳人均GDP达1.4万美元,被认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⑦。2011年,北京人均GDP逾1.2万美元,当时预计2017年北京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⑧。2012年,江苏省昆山市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些经济学家据此认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

① 莫新元 《翻两番:宏伟而可行的目标——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兆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1日第2版。

② 王金海 《我们离小康还有多远》,《人民日报》1998年7月26日第4版。

③ 乌东峰 《中国现代“小康”之发轫》,《人民日报》2003年4月11日第9版。

④ 袁亚平等 《踏浪追赶太阳——写在浙江省绍兴县滨海工业区成立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03年7月4日第9版。

⑤ 张曙光、刘龙 《相互借鉴 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05年6月19日第7版。

⑥ 《处于上中等国家和地区中的较高水平》,《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日第17版。

⑦ 王荣 《牢记经济特区历史使命 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人民日报》2010年8月23日第7版。

⑧ 朱竞若、王明浩 《北京加快迈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人民日报》2012年7月2日第4版。

看，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局部地区是可以率先做到的^①。2013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27个国家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包括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波兰等，亚洲的马来西亚、科威特和沙特等，拉美的阿根廷、智利等，而中国等34个国家属于初等发达国家^②。

鉴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动态发展的，更加准确地界定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指标是相对发展水平。学术界使用的是一国相对于美国或者说经合组织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计算，1980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三国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24.1%、21.9%和15.6%，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人均GDP的34.9%、31.8%和22.7%。这意味着中国人第一次接受国际社会界定拉美地区的三个主要经济体为“中等发达国家”时，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1/5。2005年，当韩国被中国学者认定为“中等发达国家”时，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44.0%、经合组织国家的64.3%。2012年，中国多数人接受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为1.4万-2万美元，当时美国的人均GDP为5万美元，经合组织国家为2.5万美元。这意味着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25%-4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80%。综合上述各个不同时期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即当时中国所界定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门槛值是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使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规模巨大的发展潜力，即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十四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9万多亿美元，增长7.5%左右，就会产生近7000亿美元的增量，也就是说，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③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也指出：中国“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经济总量在7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体包括沙特（7500亿美元）和瑞士（7100亿美元）。因此，沙特就是

① 孙宁华、洪银兴、苏轩黎《肩负起为实现现代化做先导探新路的使命》，《人民日报》2013年7月9日第7版。

② 何传启《2013年世界现代化指数》，《科学与现代化》2016年第2期。

③ 李克强《共同推动非洲发展迈上新台阶——在第二十四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年5月9日第2版。

④ 习近平《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6日第2版。

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标准。2022 年 9 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3—2021 年, 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 38.6%, 超过 G7 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① 只要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贡献率, 那么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按现价美元计算, 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约 17.7 万亿美元, 比 2020 年增加约 3 万亿美元, 这一增量甚至高于 2021 年法国的经济总量, 可列入当年的世界第七大经济体^②。按照 IMF 最新发布的数据, 2022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将达到 80.9%^③。

一旦总量目标超越美国变得容易实现, 那么今后总量目标在指导中国国家发展战略, 特别是设定国际战略目标时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下降。中国需要为未来发展设定新的指导性指标。有意思的是, 国家统计局在评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时, 提及了三类指标: 一是经济保持较高增速, 主要指标居世界前列; 二是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加, 主要民生指标明显提升; 三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④。从学术意义上看, 这三类指标事实上改变了以往评估国家综合实力时侧重于总量的评估框架, 而显著增强了人均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3. 第三阶段: 计划于 2035 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 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事实上, 这么多年来, 中国领导人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从来不是美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也无法在所有指标上达到美国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像墨西哥、阿根廷那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今天看来, 中国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2021 年 3 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展望 2035 年, 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⑤ 由此看出, 中国政府将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2022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9/t20220930_1888880.html

②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 2022 年 9 月 20 日。

③ 根据 IMF 2022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所得, IMF 预测 2022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 20.3 万亿美元, 美国为 25 万亿美元, 参见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October>, 2022 年 10 月 13 日。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2022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9/t20220930_1888880.html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13 日第 5 版。

平目标的时间提前了15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继续坚持这一总体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①。

鉴于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中国整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经济总量将明显超过美国。如果从人口规模出发，将中国的省市单独拿出来，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做一个比较，那么就会发现，中国有些地区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邓小平当初的构想。其实，邓小平最初在设定第三步目标时给出的是两个时间段——“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时间”。我们也逐步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省市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陆续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对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四 在总量和人均之间：中国式现代化 在方法和地理上的变革

作为辅助性的证据，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两个论点：

一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处于和美国经济科技博弈的最前沿。美国从中国已经落地生效的发展实践中看到中国崛起的冲击力，因而基于规划的中国发展前景，并不是实验室里的模型和计算，而是部分已经落地可见的实物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发展成巨型经济体的前景。美国看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超前发展形成的国际挑战。这样一种基于中国某些地区和产业的评估，与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基于整个国家和综合国力的评估方法是不一样的，由此造成的冲击效应也就不同。

二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向美国选民承诺要解决中产阶级问题，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将其外交政策称为“中产阶级外交”^②。有论者指出，过去十年，美国两党已就将中产阶级的利益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以往美国只是在经济衰退期间才会这么做，因而目前将中产阶级与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是不同寻常的，至少预示着美国内政与外交相分离的局面被打破了^③。在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了人才红利，且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②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n Must Lead Again: Recus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p. 64–76.

^③ Andrew Gawthorpe, “Taking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Serious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 1, 2022, pp. 57–75.

高技术人才集中于沿海地区，进一步和美国争夺高技术领域的主导权。从理论上说，随着中国进一步获取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中美的竞争必然加剧，冲突就难以避免，美国也会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对华实施遏制措施。这一逻辑已经被中国学术界总结为“萨缪尔森陷阱”^①。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造成这个陷阱的并不是中国整体的力量，而是基于经济聚集效应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产业领域形成的力量。

讨论中国的国力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总量特别大，而平均量比较小，那么就应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分离出部分区域。从方法上说，学术界在比较大型经济体的发展时也采用分区域的方式。近年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发现，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层面的不平等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才能准确评估全球不平等的状况。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和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减贫将极大地影响全球贫富差距的状况，一些研究试图通过把这些大国分解成省级单位，并将这些省级单位视作准国家来计算国家间的加权不平等，从而更好地评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②。国际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描述中国内部多样性的方法是：按照经济总量或者人均将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与世界若干国家进行比较。例如，有学者基于2003年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数据计算后发现，中国最先进的省份和城市，与一些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属于同一经济阵营，但中国中西部落后省份的经济水平仍然与贫穷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持平^③。还有学者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测度2003年中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结果发现，中国内部的地区发展呈现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状态^④。显然，美国从来没有将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列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更不用说是唯一竞争对手。美国真正聚焦的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并据此认为中国正在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另外一个需要加以修正的方法误区是，很多人认为，既然是评估国际的地位，那么就应该把国家视作一个整体进行比较。这一点在国际关系学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这既受到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影响，也受到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影响。从学科角度看，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世界政治”的学科体系之

^① 参见苏庆义《中美“脱钩”论与“萨缪尔森陷阱”》，《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高柏《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② Ho-fung Hung, “Recent Trends in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7, 2021, p. 355.

^③ Gerhard K. Keilig, “Many Chinas? The Economic Diversity of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No. 1, 2006, pp. 147 - 161.

^④ 杨永恒、胡鞍钢、张宇《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和不协调——历史视角下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

后，有关如何建设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大都引自美国。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最初设定的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国内问题。直到冷战快结束，这种潮流才被打破，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国内转向，将原先视作不需要进行研究的国内问题列入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①。在国际关系学科之外，则很容易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看，一个穷国改变弱势地位的合理方法是看总量，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总量变化要比人均变化更能显示出一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国际地位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仅靠国家自身就能获得的身份，还要看外部世界的承认和评估。而在外部世界看来，了解一国的内部情况几乎是极难的专业研究者的任务，因而总是从一国的总量指标讨论该国的影响力。

如果说以往这样一种整体性方法适于分析中美关系，那么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特别是中美在很多领域发生冲突，这样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就不够用了。我们看到，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被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不同的是，报告强调“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时，“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②。这两个表述是以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未曾出现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建立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立足点就是沿海地区的2亿人口，如今转向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依然强调东部沿海地区在现代化建设和开放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东部地区的这种特殊地位主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的GDP加以比较，中国最小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总量排名也位居世界前140位。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有4个中国的省，包括广东省（第11位）、江苏省（第13位）、山东省（第18位）和浙江省（第20位）。如果把全球低收入经济体看作是一个，仅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就比全球所有低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还大，并且中国大陆的省级行政区中居世界第21-50位的就有13个省市^③。与中国的这17个省市交替在一起的，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如位列江苏和山东之间的韩国，福建和湖南之间的越南，江西和重庆之间的瑞士，辽宁和云南之间的比利时。

^① 代表性论著如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bert Koehane &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页。

^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

至少有5个理由将中国的沿海省市与人均GDP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体进行跨国比较。第一,就人口规模而言,中国不少省市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相差无几。除美国外,中国都能找到人口规模相当的省市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匹配。第二,收入高的经济体一般开放程度也较高,而中国沿海地区在中国所有省市中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第三,从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联系看,中国沿海地区与世界的联系也最为紧密。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商品出口额在1万亿人民币以上的中国省市有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山东和福建,上述7省市合计出口24.4万亿人民币,占当年中国总出口的75.6%。这些省市的贸易依赖度(即贸易占GDP比重)与全国的趋势是很不同的。2020年,全国平均水平的贸易依赖度下降为31.9%,然而,这些沿海省市的贸易依赖度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面貌,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别是上海(90.1%)、北京(64.6%)、广东(64.0%)、浙江(52.3%)、江苏(52.3%)和福建(32.1%)。这些省市是中国开放发展的代表,来自这些省市的企业也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引领者。再以外商投资企业户数为例,2020年中国共有63.5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在3万家以上的有7个省市,依次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和福建,7省市合计有外商投资企业47.5万户,约占全国的74.7%^①。

第四,中国沿海地区不少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人均GDP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中国的人均GDP于2020年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当年中国为16 297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6 270美元,在世界平均水平附近的国家有墨西哥、泰国和伊朗等。中国不少沿海省份和大城市的人均GDP水平其实很高。例如,2021年,北京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上海为3.8万美元,江苏接近3万美元,福建、天津和浙江为2.5万美元,广东为2.1万美元。从国际比较看,新西兰的经济总量和甘肃省差不多,但其人均GDP和北京相当,因而北京的发展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就人均GDP而言,上海和阿联酋、以色列接近,江苏和意大利相当。人均GDP在2.5万美元附近的有马耳他、西班牙和科威特,从发展阶段和人口规模看,福建和西班牙可以配对成一组^②。

第五,中国人均收入在还没达到美国三成时就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和日本、韩国具有一定类似性,即经历一段时期

① 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

10%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下降到4% - 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对于这种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下降，学术界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一旦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往往会出现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均收入持续提高，或者说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程度逐渐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趋同，经济增长率自然就会下降^①。日韩出现第一次经济增长降速时分别是1974年和1992年，第二次经济增速放缓时分别为1992年和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1974年日本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57.9%，1992年日本第二次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83.6%；韩国在1992年迎来第一次经济增速急剧下降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35.8%，2008年进入第二次经济增速下降时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58.2%^②。因此，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经济增速放缓时，日韩的人均GDP至少都相当于美国的35%以上，与美国的差距都要显著小于中国。而即便以购买力平价衡量，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7.6%（2021年才达到27.9%），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机，不太好用日韩的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解释。换一种思路，考虑到日韩的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以及开放程度，将中国充分融入国际市场的沿海地区作为一个衡量单元，计算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就能更准确地理解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且有助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经济策略。

我们也可依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现价国际元）来进一步度量中国若干超级城市在全球中的位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列出了36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但不少城市的数据并没有更新至2021年^③。利用各城市发布的2021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可以整理出2021年度的各城市人均GDP、城市常住人口以及对外贸易数据。如表1所示，共有15个主要城市的人均GDP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15个城市的常住人口约为2.1亿，但是外贸总额高达25.7万亿人民币。15个城市以不到全国15%的人口贡献了66%的外贸额，因此可以说，这些城市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这15个城市中，北京、苏州的人均收入与以色列、日本所差无几；上海、宁波、广州、杭州可对应西班牙、波兰、葡萄牙和罗马尼亚；武汉、厦门可对应着希腊、土耳其。表1所给出的城市信息，不仅准确描绘出中国沿海地区的新发展坐标，而且也证实了前文的判断，这些地区和城市事实上已经

① 刘世锦《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② 以上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计算，参考<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2022年10月13日。

③ 可参考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5>，2022年9月3日。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表 1 人均 GDP 领先中国的经济体与中国沿海城市比较 (2021 年)

城市	人均 GDP (元)	常住人口 (万人)	进出口额 (亿元)	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的 人均 GDP (现价国际元)	对应国家	对应国家按 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人均 GDP (现价国际元)
北京	183 999	2189	30 438	43 941	以色列	43 722
苏州	177 500	1285	25 332	42 389	日本	42 940
南京	174 520	942	6367	41 677	塞浦路斯	42 556
深圳	173 663	1768	35 436	41 473	爱沙尼亚	42 192
上海	173 593	2489	75 743	41 456	西班牙	40 775
宁波	153 922	954	20 531	36 758	波兰	37 503
广州	150 366	1881	10 826	35 909	葡萄牙	35 888
杭州	149 857	1220	7369	35 788	罗马尼亚	35 414
青岛	137 827	1026	8498	32 915	斯洛伐克共和国	33 010
福州	135 298	842	3322	32 311	俄罗斯	32 803
武汉	135 251	1365	3359	32 299	希腊	31 295
厦门	133 218	528	8877	31 814	土耳其	30 472
天津	114 311	1373	8567	27 299	哈萨克斯坦	28 600
大连	104 764	747	4249	25 019	保加利亚	26 705
成都	94 622	2105	8222	22 597	黑山	22 795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各城市统计局、世界银行。

中国和美国在高精尖且面向市场的技术领域的竞争，也主要是在这些高收入的城市之间上演。美国的高科技和高技术人才也聚集在若干个大城市。在美国的定义中，上过大学的人才都被看作是高技能工人。美国学者研究发现，虽然经合组织国家占世界人口不到 1/5，但它们拥有 2/3 的高技能移民。2010 年，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经合组织内近 70% 的高技能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其中，仅美国就接收了经合组织内近一半的高技能移民以及全球 1/3 的高技能移民。高技能人才之所以聚集到这些国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同样也是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和研究中心的集中区。就美国而

言，这些人才的职业高度聚集，往往是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经济商业和医生，这些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提供高密度的知识服务。不仅如此，高技能人才的地域分布也是高度不平衡的，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迈阿密、北加州、南加州和西雅图等城市聚集了最大量的高技能移民^①。除了芝加哥（五大湖地区），其他城市也是集中在美国的沿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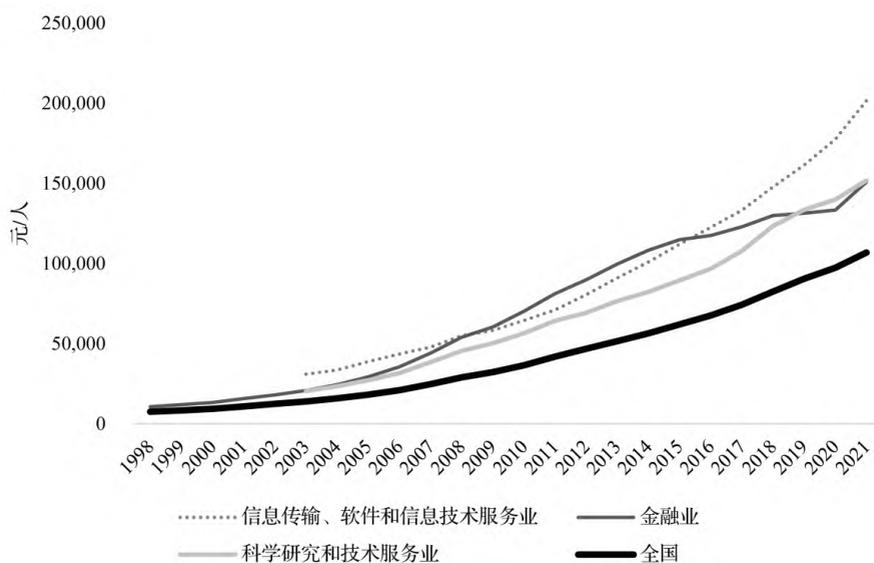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于全国水平的三大行业

资料来源: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CEI.net), <https://db.cei.cn/jsps/Home>, 2022年8月27日。

中国近些年高工资的行业领域与人才的地区聚集，与美国呈现出惊人的类似。如图1所示，202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06 837元，平均工资超过15万元/年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图1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10—2021年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先后被IT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超越。中国加入WTO之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金融业快速发展，因而金融业平均工资从入世之初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4成，一路扩大至2013年的近1倍。不过，在此之后，金融业的工资增速开始下降，2016年被IT行业的工资水平超越，

^① Sari Pekkala Kerr etc., "Talent Pools: Why Skill Tends to Concentrate", February 6, 2017,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2/talent-pools-why-highly-skilled-worked-concentrate-in-the-same-location/>

2021 年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超越。这种变化轨迹揭示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吸取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注重经济“脱虚向实”，发展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是重视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因而极为重视人才红利和 IT 行业的发展。

对于开放的市场经济体而言，吸引人才最为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工资，而沿海地区不少城市的工资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06 837 元，实际增长 8.6%；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年平均工资和增速均最高，年平均工资为 124 019 元，同比增长 10.4%；中国最高和最低地区的平均工资之比为 1.48，比上年扩大 0.03^①。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20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9.7 万元人民币，高于平均水平的全国主要城市有 24 个，其中平均工资在 11 万以上的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广州、杭州、拉萨、天津、青岛和宁波等 10 个。上述 10 个城市中除了拉萨之外，其他均在沿海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双子星——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平均工资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在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广阔就业前景和行业高工资的吸引下，过去 10 年，中国人口流动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群进一步聚集。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 2020 年底，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的 39.93%。与 2010 年完成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10—2020 年间，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 2.15 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下降了 1.20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了 0.79 个百分点^②。沿海若干省份和大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十分可观。截至 2020 年 11 月，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 601 万，比 2010 年增加 2170 万，年均增长率为 1.91%，比上一个十年的年均增速提高了 0.01 个百分点^③。浙江省 2020 年常住人口为 6457 万，比 2010 年增加 1014 万，年均增长 1.72%^④。而且，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向省会城市和高科技城市聚集，杭州占浙江全省人口的比重从 2010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106837 元》，2022 年 5 月 20 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5/t20220520_1857635.html。城镇非私营单位指的是，城镇地区全部非私营独立核算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租、水电费等。

② 宁吉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2021 年 5 月 11 日，http://www.stats.gov.cn/zt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693.html

③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稿》，2021 年 5 月 15 日，<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1/421314/3283438.pdf>

④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21 年 5 月 13 日，http://tjj.zj.gov.cn/art/2021/5/13/art_1229129205_4632764.html

年的16%增长至2020年的18.5%，广州占广东省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12.2%上升至2020年的14.8%，深圳占广东全省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10.0%上升至2020年的13.9%^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省市的高学历人才比例也大幅度提高了。2020年广东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了1978万，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010年的8214人上升至15699人^②。浙江同样经历了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扩张，2020年达到1097万，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010年的9330人升至16990人^③。这些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主要流入的是深圳、广州和杭州等城市。截至2020年11月，深圳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8849人，广州为27277人，杭州为29317人。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中，每100人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54.6%^④。简单计算即可发现，目前杭州常住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350万，广州和深圳均超过500万，北京超过1200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上海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总人口超过840万^⑤。由于人才聚集，上述四个城市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总计接近3000万，成为中国创新的主战场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排头兵。

因此，2010年以来中国沿海省市在全球发展版图中的地位快速攀升，并且要比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攀升的幅度大得多。这或许是导致美国过早地与中国走向战略竞争，而中国始终认为美国没有读懂中国、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所在。

五 几点结论

未来十年均被中美认为是关键性的十年，但中美对彼此关系性质的界定迥然不同。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希望美国正确认识中国的实力和意图。而美国根据以

①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2021年5月15日，<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1/421309/3283428.pdf>

②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2021年5月15日，http://stats.gd.gov.cn/tjgb/content/post_3283433.html

③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21年5月13日，http://tjj.zj.gov.cn/art/2021/5/13/art_1229129205_4632764.html

④ 《2022年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年度统计资料发布计划》，2021年12月31日，http://tjj.beijing.gov.cn/tjsj_31433/tjbmfjbh/ndtjzl_31437/2022ndtjzl/202112/t20211231_2580225.html。此为抽样调查数据。

⑤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21年5月18日，https://tjj.sh.gov.cn/tjnj_rkpc/20220829/734169a3ce96405e88917bebd78376bf.html

往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认为中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并可能赶超美国，因而持续加强对华的打压和遏制。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集中在分析美国的地位焦虑，以及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革。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但是，进行这样的一种结合，不仅需要理论上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也要从方法上打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整体主义思维。中国转向注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表明传统的发展战略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调整，因而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过去十年注重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不能将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革联系起来，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会走入思维的盲区。

地位变化的确是引发美国焦虑以至于对华过早地进入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但这类解释不够完整。美国依据历史经验，早在 20 年前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差距甚大的时候，就根据中国可能在 2025—2030 年挑战美国的这样一种前景，开始防范中国。只是因为在此期间，有更大、更紧迫的现实挑战摆在美国面前，美国才不得不分心而在别的区域投入战略力量。虽然我们多次向美国解释和说明，希望美国准确解读中国的发展和意图，但美国下定决心将中国视作 21 世纪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我们也要改变思维，重新去思考美国为何不断地渲染中国的威胁，并且过早地与中国走向战略竞争。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思维并不是寻求赶超美国，而是基于对自身国情和发展能力的评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地位焦虑论中对地位变化的分析相比，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三次大的跨越式发展——最初将目标定位在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将目标修改为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近一次则是 2021 年的“十四五”规划定于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美关系较好的一个时期，中国事实上延迟了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时间。但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加速发展，大幅度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最终确立提前 15 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变革。上述目标的阶段性调整，特别是将中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不仅被证明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让美国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一种摆脱西方发展模式控制的新的发展道路，让美国产生了“中国恐惧症”。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美国之所以有这种恐惧症，并且始终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读懂中国，其原因在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要显著快于中国的平均水平，走在了大国竞争的最前沿。从改革开放之初起，中国沿海地区就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目前拥有中国 3/4 的外贸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形成了对高素质人才富有吸引力的高工资，是中国创新高地，并进而成为中国参与国

际竞争的主战场。不过，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人口还处于低收入水平。但在美国看来，这部分人口及其所在的区域，其实并没有广泛地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似乎对美国的影响不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并不了解，因而很容易依据对沿海地区城市和技术的发展来评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美国过去十年面临着中产阶级萎缩的挑战，并将原因归结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如此一升一降，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担忧和焦虑。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仍将进一步发展，而美国虽然霸权衰落，但总体国力仍将维持。因此，如果双方都从整体主义看待彼此的实力地位和意图，就容易夸大彼此对对方的威胁。随着中国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美国实施注重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事实上已经为中美重新理解彼此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域和区域的合作开辟了空间。未来，中美都应该重视这些区域和人口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校正看待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框架。

【责任编辑：吴宏娟】

Myanmar.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SEAN's initiative to constructively intervene in Myanmar's affairs has been strengthening, as demonstrated by its responses to the Depayin E-vent in 2003, the Saffron Revolution in 2007, Cyclone Nargis in 2008, the Rakhine Crisis since 2012, and the Tatmadaw's re-takeover of power in 2021. These five cases demonstrate that ASEAN's adjust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Myanmar have clear limitations. These adjustments enhance ASEAN's discourse power in regional affairs while impac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its member states. However,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ASEAN is the bottom line that cannot be touched by ASEAN's adjust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Keywords】 ASEAN;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Myanmar; Adjustment; Southeast Asia

【Authors】 YANG Xiangzhang, Associate Fellow, 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stitute of Myanmar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LI Zhongyang,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Sino-US Competition

ZHONG Feiteng

【Abstract】 In spit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pposition, the United States defined Sino-US relations 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three kinds of approaches of this situation, namely, the US misjudgment approach, the US status anxiety approach and the Sino US domestic governance approa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United States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prematurely lies in the 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exceeded the United States' expecta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not to surpas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but to reach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form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dopted a foreign policy that serve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inspiration for this change in methodology i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break away from holistic thinking and recognize the impact of unbalanced domestic development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reason the United States misunderstood China and experienced status anxiety is that it actually regarded the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stal areas as a sign of China's future power status, overestimated China's inter-

national status and its intention to replac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lso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aints on foreign policy imposed by China's repeated emphasis on the duality of low per capita and large aggregate. Looking to the futur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regions that participate les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their foreign policies.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ino-US Competition; Eastern Coastal Areas;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Author】 ZHONG Feiteng,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The EU's Foreign Strategic Shifts and New Trends of Its East Asian Security Policy

WANG Zhenling

【Abstract】 Due to recent rapi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e EU has undergone a strategic awakening and significant shift in its foreign strategy, focusing o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participation in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EU's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shows both continuity and new trends. Firstly, the EU continues to prioritize normative objectives such as values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and presents itself as a "principled" security actor. Secondly, the EU has assumed the role of a "maritime security provider" and, while increasing the pragmatism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its security policy, has encouraged its member states to increase participation in "free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rengthen naval diplomacy and deployment, and provide a hard power guarantee for its role as a maritime security actor. Thirdly, the EU declares itself a third-party position and seeks to establish its own strategic space while trying to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needs to be alert to the changes in its neighborhood resulting from the EU's strategic and policy shift, increase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EU, and strive for the EU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neutral position in specific policy areas rather than completely following the US.

【Keywords】 EU; Foreign Strategy;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Strategic Autonomy; Geopolitics; Indo-Pacific

【Author】 WANG Zhen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